

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的一个瓶颈

寇春莹, 魏桦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日本政界要员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也与日本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参拜之举也是政客为迎合国内政治气候的一种政治手腕。进入新世纪,中日两国只有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把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才能够保证中日关系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靖国神社; 中日关系; 军国主义; 政治意义; “谢罪疲劳论”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4)03-0018-04

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两国间三份重要文件^[1](P.517)]中达成的共识。然而,近年来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靖国神社概况

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1879年6月,明治天皇决定将东京东山九段的招魂社改名,正式命名为“靖国神社”。祁隆在《靖国神社揭秘》一书中指出:在日语里,“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靖国”即“安国”,希望以靖国两字来祭祀祖先,保护日本将来的福祉。因此,在日本文化中,“靖国神社”也就是安邦定国、永事平宁的神社,供奉在这里的“神”就是把日本建成一个“和平”国家和“保卫”日本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2](P.14)]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安魂”。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即只有为天皇为

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的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在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靖国神社已经完全变为军国主义愚弄和笼络国民的宗教工具。

那么,在广为亚洲国家瞩目的靖国神社里,究竟供奉了些什么呢?

靖国神社中有一座被称为灵玺簿奉安殿的大殿。它建于昭和47年,供奉有明治维新以来250万军人的灵位,包括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灵位。其中,有戊辰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有为创建新政权而死于“佐贺之乱”、“西南战争”等日本国内动乱的人士,但更多的是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战争中阵亡的军人。据统计,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而在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人,1978年10月,这些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灵位被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东京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

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

二、日本政界官员的“参拜史”

由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2001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今年4月，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宣判小泉纯一郎“以内阁总理大臣之职进行正式参拜，属于宪法第二十条所禁止的宗教活动范畴，是违反宪法的”。^[3]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右翼势力不断施压，日本政府把8月15日作为“追悼阵亡者和平祈祷日”，此后一些政要相继参拜靖国神社。1975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8月15日以“私人名义”前往参拜靖国神社，首开首相参拜先例。^[4]中曾根康弘上台后，于1985年8月15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率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选在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战败日。在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的和平人士强烈谴责后，从1986年起，日本首相暂时放弃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日益“右翼化”，日本政要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规模和频率都超过以前，小泉纯一郎内阁成立后，更是愈演愈烈。

小泉上任之初，即宣称要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并不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反宪法的”，希望能够对那次战争中的日本战死者表示衷心的敬意和哀悼，并呼吁邻国不要再反对日本政客一年一度的参拜活动。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迫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提前参拜靖国神社。参拜前发表声明说：之所以选在8月15日前参拜靖国神社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作为首相，对自己没有履行先前做出的承诺深表遗憾”；在其参拜之后的对外讲话中，小泉有意回避甚至不愿多提侵略战争，并以“向所有的战争牺牲者致以哀悼”一句，将当年对亚洲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战争罪犯纳入他的哀悼对象中；最后，在靖国神社的留言簿上，小泉写的是“小泉纯一郎首相”。

2002年4月21日，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23日，超党派议员组织“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88名参众议员、90多名议员代表也浩浩荡荡前往参拜，其中包括自民党、保守党的主要负责人。小泉参

拜之举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作为代价，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友好交流气氛受到损害，中国决定推迟日本防卫厅长官访华和中国海军军舰访日，两国政府间的高层交流停滞不前。小泉欲在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以日本首相身份正式访中的计划也被迫搁浅。

2003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界反对，在其任内第三次强行参拜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靖国神社，不仅激起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在日本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应，抗议谴责之声不断。据中国青年报发自东京的消息，《朝日新闻》当月15日发表社论，对小泉“缺乏外交感觉”的行为提出批评，指出靖国神社是战前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象征，是动员国民参战、煽动战争思想的罪魁祸首，如今又供奉着二战的甲级战犯，对这样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是不可能得到日本国民和周边国家理解的。此外，参拜行为也决不可能以个人思想信仰来做搪塞。该报指出，小泉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使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的访华愿望落空；如今，正当朝鲜核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协调合作时，小泉的再次参拜无疑给国际合作制造了障碍。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也发表了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的谈话，以抗议小泉参拜，并指出靖国神社不仅是战前军国主义的象征，也是战后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分子的崇尚之地，首相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参拜，都是肯定侵略战争的表现，是引起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战争反省产生怀疑的愚蠢行为。小泉是第一个连续三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其责任重大。

三、透视参拜问题的背后

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中日两国能够摆脱战争阴影，重新恢复邦交，就是因为双方在历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么在迈入新世纪的今天，为什么日本政要仍然一意孤行参拜作为军国主义象征的靖国神社，为双边关系的发展造成障碍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历史根源上看，战后美国采取扶日反共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势力未得到认真批判和彻底清算。战后初期，日本军国主义本应彻底铲除，但由于当时美国为了利用天皇制占领、统治日本，而免去了在远东军事法庭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使日本旧的国家组织、人事系统得以部分保留，这使日本错过了一次举国彻底清算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机会。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美国抛弃了在日

本实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转而采取变日本为美国“远东兵工厂”的政策,使日本成为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一个前哨阵地,这样日本军国主义的部分残余得以保留下来。1950年3月,美国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释放了所有日本在押战犯。一部分战犯、旧军人、旧职员后来重新进入政界,甚至在美国扶植下掌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权。战时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年竟成为日本首相。因此,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这个问题在日本至今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许多民众更多地认为日本是二战中原子弹的受害者,而对于加害国的定位则较为淡化。于是,靖国神社也得以将二战中的战犯同以往日本历史中的阵亡将士灵位加以笼统的祭祀和供奉,为政界人士以民族传统为名义而“忽视”神社的特殊政治意义、对神社中的战犯牌位一同加以参拜提供了条件。由于对战争未能从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反省,日本国内的右翼思潮近年来得以日益抬头,在审视历史、评价战争等方面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誓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的角色,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大力鼓吹政要亲自前往参拜,并且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小泉出任首相,得到了党内右翼势力大力支持,自民党内某些幕后关键人物一贯支持政要参拜,深受其影响的小泉公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示强的民族心理及其滋生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方面,日本有一种不服输不服气的民族气节,日本政治家有句经典的描述是,日本这个民族是不会被打扁的。这种不服输的民族气节经过内外环境的激化而愈加明显。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后半叶日本迅速攀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使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迅速膨胀,并达至根深蒂固,而随后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长达13年的经济萧条,给日本国内民众带来一种沮丧和失落感,由此而导致的心理错位,又带给了他们某种振作的“动力”^{[5] (P. 5)},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由此渐起,所谓的“谢罪疲劳论”大有市场,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学者更是宣扬中国等亚洲国家是在对日本打“历史牌”,激起日本国内民众对这些国家的反感,社会舆论质问“日本究竟要谢罪到几时”;一些政界要人更加有恃无恐地表示要参拜靖国神社,至于历史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正义与否,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都被抛之脑后。

第三,新生代政治家走上前台,政治气候改变。上世纪末,日本政界进行了新老交替,老一辈对战争有负罪感的政治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的政治家,特别是参与防务和外交领域的少壮派政治家,他们心中没有战争负担,历史负罪感淡化,胸怀把日本塑造成为政治大国的抱负,强调日

本回归为“普通国家”,摆脱历史的沉重包袱。他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属于“内政”问题,因受到中国、朝鲜、东南亚国家的反对,首相就中止正式参拜,是“轻易地屈服于外国的恫吓,歪曲了国家的根本”,^{[6] (P. 336)}视为不可容忍。同时,日本政坛上一直主张走中立道路的政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在力量对比上相对于自民党、保守党等保守力量,是处于下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空气是“总保守化”。2003年9月,小泉顺利蝉联自民党总裁并保住了首相位子;在11月初的众议院选举中,虽然民主党作为在野党的力量在众议院里显著上升,对执政党形成一定牵制,但是保守党新党随即宣布并入自民党,使三党联合执政变为自民党和公明党两党联合执政,自民党主导的联合政权在众议院里依然保有绝对优势,^[7]小泉的执政地位未受到强力削弱。小泉纯一郎领导的自民党今年初通过了2004年运动方针,确定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以“感谢和追悼战争牺牲者”以及2005年修宪等内容。看来,在小泉任内,靖国神社问题依然会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之一。

最后,“参拜”行为本身成为日本政治家进行国内政治角逐的一种策略。从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看,还看不到能突破“靖国神社”这一外交瓶颈的出口。因为在日本,“参拜”实际上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小泉上台,很大层面是借助于小泉的改革旗号、一改陈旧言论的作风和敢说敢做的鲜明个性,才获得十年来鲜有的高支持率的。上台后,面对日本经济疲软、股市低迷、失业增加、人心浮动、民心思变的状况,日本政坛人物任何所谓变革的“果敢言行”都会引起关注,小泉为了争取部分选民支持和迎合国民期盼强势政治家出现的心理,利用“1955”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其制衡功能日趋减弱的局面,希图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大胆的举动”为自己树立形象,表现出强烈的“我行我素”、“敢于说不”、“敢做别人所不为之事”的政治风格,拉拢部分情绪浮躁的民众,维持较高的民意支持率。这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2001年8月份的参拜。次年4月份,小泉已执政近一年,但是不但改革未见成效,经济毫无起色,而且政坛丑闻迭出,小泉的支持率从超过80%下跌到40%多,执政基础岌岌可危。小泉亦希望通过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显示自己的强势地位,迎合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势力和国内部分民众的需求,维持执政基础。进入2003年,面对9月份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以及11月初的众议院选举,在自己地位并非稳如磐石的形势下,为了防止反对势力攻击,迎合相当一部分日本政界人士和日本选民的大国心理以保住部分选票,小泉已有言在先,每年必参拜一次,作罢之念未见丝毫。

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日本政府官员不顾中国等亚

亚洲国家人民的情感,多次违背民意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对此均表示了强烈愤慨,尤其是对高层官员挑选战败日进行公然的参拜提出了严正抗议。因为靖国神社不仅具有宗教性质,更具有严肃的政治性,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检验日本政治家对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态度的试金石。中国等亚洲国家之所以强烈反对日本首相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他们的参拜也意味着对甲级战犯的参拜,这使中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政府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中方一贯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理应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反省这段历史的诚意,而不应做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事情。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愈益突出,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树立了重重障碍,而且严重冲击了两国关系的互信基础,成为中日政府关系的一个瓶颈。

四、结束语

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问题的实质也不在于“官方身份”还是“私人身份”,而在于对过去那场战争采取什么立场,要向国内外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和导向。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正因为如此,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衡量日本政府对待那场侵略战争态度的标尺,也成了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中的一个外交瓶颈。如何促使日本政治家在参拜

问题上端正态度,正视历史,尊重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关系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容忽视。

由于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关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尽管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但是在努力跨越障碍的基础上,2003年两国关系还是取得了一系列实际进展,这包括5月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在圣彼得堡的会晤;9月,吴邦国委员长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对日本进行的成功访问;小泉首相多次强调日方也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意味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开始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语言;通过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访华,一度中断的中日军事交流重新启动;曾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停下来的中日部长级会晤大都得到恢复;在解决朝核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表示希望并支持日本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等等^[8]。可以看到,在处理对日关系中,中国政府表现的是非常务实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目前对日交往中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

应该看到,中国对日政策近几年来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在历史问题上就是突破了就历史讲历史的框框,把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不再纠缠于道歉与谢罪的具体细节上,而是以历史作为中日关系的一面镜子,防止日本国内的右翼或者狭隘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干扰。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主要是希望以史为鉴,端正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使两国今后的合作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 徐之先. 中日关系三十年[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 [2] 祁隆. 靖国神社揭秘[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 [3] 于涛. 福冈法院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法[N]. 参考消息, 2004-04-08(1).
- [4] 张森林. 关于妨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历史认识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0(9).

- [5] 陆忠伟. 中日关系: 理解与推进[J]. 现代国际关系, 2003(9).
- [6] 薛君度, 陆忠伟. 颠簸的日本[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 [7] 中央社东京. 日本众议院选举[N]. 参考消息, 2003-11-11(1).
- [8] 冯昭奎. 今年中日关系关键词: 新时期 新思维[J]. 世界知识, 2003(20).

(责任编辑 齐琳)